

海，复劝鼎力再捐，得银六百员。然乡内未能尽一：犹不敢进行也。时因上海城陷，贼匪扰攘，故十二月永立、启勋侄祖潜梁兄等旋里，见围墙介在成败之间；相与鼓舞激励，由是忍千发奋，于四年（1854）正月初二日，在乡开束劝捐，共捐银五百余两，连上海共得银壹千五百余两。此时众心踊跃，事遂成焉……至六月，翠三语余曰：除捐外尚欠银五百余两，需早筹备，以免临时周张。余见乡内断难多捐，因将骑虎难下之势再札上海，劝各殷富额外鼎力，善始善终，果也。于闰七月廿三日，接上海回札并银六百四十员，真可谓豪情胜慨，言听计从，令人色飞眉舞也……共用银二千一百余两……向非上海殷户叠次加捐，安能干此大事哉……”《子英房谱》

从上面的几篇史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经过“唐家人”一代又一代的艰苦创业，奋勇拼搏，从清朝道光以后，唐家村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但是，作为“唐家人”的后代，我们更应该清楚谨记，在我们的祖辈、父辈当中，当年有不少人为了求得温饱或希望发家致富，不惜忍痛抛妻别子，离乡别井，去金山掘金，希望在短暂的岁月里达到自己的心愿。他们为此目的不但虚度了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这一点：就连美国的史学家也认为：“就美国西部的开拓史而论，不少华人贡献了宝贵的生命”。见唐族豪杰房廿二传孙唐理修在民国八年（1919）撰写的《南恒唐公祠》碑文中写道“……是时，乡中之趁金山者，有满载而归，先祖父（指南恒公）思念儿女众多，家计日绌，因率先继父致祥公往金山作采金事业。到埠一年，因事牵累，致祥公在埠有病，是以父子带病夜趁桅船返梓，船行至中华海面，致祥公因病将逝，船主西人横蛮无理，硬将尸抛入

海。闻抛海之际，致祥公尚能口喊父救，先祖父救子情急，立即发狂，诿西人竟用大缆将先祖父捆于船边。是晚，同船鸡柏人唐义福持粥安抚先祖父，先祖父乃详告因儿子突遭变故无面见江东之义，嘱他解下身上金腰带，送回唐家。当晚夜深遂咬断绳索，跳海骑鲸。呜呼痛哉千古。次日，唐义福在绳边又执到金牙两只，连同金腰带一并送交先祖母手收，并详告此事。呜呼，余今述此，尚情犹不已。”

在此，编者禁不住向侨居海外华裔的乡亲们，向国内的侨眷们说：“我们的祖辈、父辈当年的遭遇为什么这样悲惨，我们应该珍惜壹佰多年的华侨奋斗史，更应该珍惜炎黄子孙今天的国际地位。”

唐家村(鸡柏村)的鼎盛时期

十九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表现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突破了“闭关锁国”的禁锢，而向前发展的时期。而唐家村当年各方面的发展也和它“息息相关”的。

“鸦片战争”打开了列强进入古老中国的“大门”，腐朽的清皇朝及一些大小官僚们，在事实面前，为了封建皇朝的利益，认为有必要“效法泰西以振兴国朝”，这样，以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楨为主脑的“洋务派”，掀起了“洋务运动”。

随着“五口通商”以后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沿海大小港口都“对外开放”了。形形色色的“洋商”，在他们政府的保护下，进入了中国。他们迫切需要一批能为他们的利益做“架桥铺路”的中国人，“买办阶层”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

历史很凑巧，当年在中国兴办的三个现代化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的主持者都是香山人。他们是：唐家村的唐廷枢（唐景星），北山村的徐润（徐雨之），三乡村的郑观应（郑官应）。他们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员，他们是“买办阶层的代表人物和民族资本的创始人。”（见《唐廷枢研究》129页）

当年，在闽、沪、汉经商成为殷商富户的“唐家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着想，纷纷送子弟们出洋留学或者去大城市的“洋学堂”读书。而在“金山”定居的华侨，就更加着意栽培他们的子弟了。这样，官费留美的唐家村人唐绍仪，留日的唐宝锷，还有鸡柏村的唐国安等等，被培养成材了。这一大批的“少壮派”在晚清、民初时期的卓越成就和他们对家乡的贡献，

使得唐家村、鸡柏村各方面的建设趋向鼎盛……他们在国内外以“劝捐首事”的名义带领侨居国内外的乡亲们为家乡建设的经费大力捐赠。以沪、汉商人唐翘卿为首，联合唐家梁族、上栅梁族、会同莫族，共同注资创建的“江西会”，以其雄厚的资金为家乡建设提供经济援助。

光绪朝，唐家村基於治安防御的需要而成立了“唐家村团防局”，为了支持这一支保卫家乡治安的地方自卫部队，“江西会”提供了钜额银两购买田产作为经常费用开支的可靠保证。

《团练公产红呈》(文武庙藏碑)

为筹备公产，接济团练，乞恩批示存案以垂永久……幸得乡人齐心，挨户联请银会，买受小榄石围贰顷四十亩，恒足围壹顷五十亩，业经印契割税，自开新三未唐家乡团练局名字办纳粮务，按年勇粮，将期价发给……为此稟请宪台……我等自当遵守泐石……”

钦加知府銜补用直隶州兼理靖海水师

肖字营调署香山县李

阳春县正堂肖批：

唐其翰等如稟即存案以垂永久。

光绪十二年(1886) 月 日

《碑文》 (节录)

盖闻保卫村庄，全赖巡查之周密，团练乡勇，必筹款项之丰盈……兹合通乡之力，为固山之计，共请江西会得银万陆仟一百五十两，承受小榄石，恒足围共叁顷九十九亩……待到会满之日，团费一切均有所资矣……”

值事：唐廷庚梁国顺(五人)

里人：唐其翰谨撰唐恩桐书丹

光绪十二年月日

“祖庙”(圣堂庙)是唐家村现存的最古老的庙宇,道光七年(1827)由梁尚举撰写的第二次重修碑文中有:“……我乡之立庙,或宋或元或明,其详不得闻已……惟自甲子重修……”(按甲子似属乾隆九年(1744))说明有文字记载可查的圣堂庙到今天已有245年了。一个乡村的庙宇规模从某一方面确实是能够反映当地历史和财富的。下面引用同治二年有关“三庙重修”及其他庙宇的重修碑文,看看这段时期“唐家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建设。

《三庙重修碑文》(文武庙藏碑)

“……夫(祖庙之建)不知创自何时,传说开村之初,土广人稀,林中常见香烟缥缈,众心灵之,於是始立圣堂庙,阙后地辟人稠,又立二帝金花庙,其由来久矣……惟是前两次重修只换瓦面,并无行墙。维时工料价贱,好尚朴古,约弗二千余金可以足用。今即砖瓦木石,倍蓰於前,加以风气奢华,花样作致,非壹万金不敢举手。言及比众皆骇然,幸而近年新开上海、汉口、九江、福州等埠,各路通商,我乡人在诸埠贸易者,指不胜屈,且大有起色,爰集庙发柬,至各埠劝捐,数月间,共捐得银壹万壹千两……上年修筑围墙……卒奏成功,神力帡幪已可慨见,今之修庙工程浩繁,几于扛鼎之难,不料吉柬数张,坐致捆载而归……令人惊喜过望……我乡富贵科名,代不乏矣。前贤之善作,必要后人之善成,方能相得益彰也。此中升降机关,虽曰人力为之,良由乡运使然……”

同治二年(1863)里人增贡生唐步瀛敬撰

附：乐捐地区(国内暂不记入)

檀香山劝捐值事：唐永秩唐昭杰

金山埠劝捐值事：唐永珍梁泽翰

《重修花堂庙碑文》(花堂庙藏碑)

乡之有花堂庙其来久矣……自咸丰戊午年(1858)重修，迄今又数十寒暑……於是集议捐签，幸得倾心相助……”

福州捐银首事：唐丽如唐道桔

上海捐银首事：唐茂枝(唐廷植)唐冠先

汉口捐银首事：唐高亮(唐翹卿)唐高权(唐瑞芝)

开平矿劝捐首事：唐景星唐郁君

檀香山劝捐首事：唐廷扬唐高培

一堡捐银：二百五十元正

二堡捐银：一千零七十元正

三堡捐银：五百三十元正

四、五堡捐银：二百一十元正

光绪十六年(1890)月日

时间相隔才二十多年，当年为了重修围墙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动员全乡力量加上再三到上海劝捐，才得到一千九百两。而像上述两事，却轻易地筹集一万多元，这不是小农经济所能办得到的。另外，贯通唐家的万安大街(今名山房路)、稔沙街(今名大同路)、边山直街的长条石板路面及石砌下水道工程等，这些工程浩大支出金钱庞大的社会建设，据父老们的回忆，都是旅居国外的侨胞和在国内各通商口岸营商致富的殷商乡亲们捐资兴建的。说明只要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人民

生活改善，经济上有了富余，这样，运用社会的经济力量去进行建设是容易成功的。正如《居俊祖祠堂重修记》所说的“盖尝论之，子孙贫则祖宗不能独富，子孙富则祖宗不能独贫……”遗憾的是，这些工程庞大的乡村社会建设，竟然连一点史料也没有遗存下来……

伴随“五口通商”而来的西洋文化，使得当年的“唐家人”在“求知”方面出现了分歧。一部份人仍然留恋旧的封建制度文化，冀求“晋身科甲”而苦读诗书；另一部份则抱着“求得富国强兵之道”，而进入洋学堂。

在科举方面有：

唐元辉：同治壬戌并补己未科第六十五名武举。

唐汝源：光绪甲午顺天第七十名举人。

唐虞俊：光绪丁酉科第二百七十三名举人。

唐炜琛：光绪辛丑补行庚子恩科第一百零二名举人。

而在外国留学并取得学位，回国后又参与例行殿试合格而授予科甲称号的：

唐绍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赐进士。

唐宝锷：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学士、光绪三十一年朝考一等赐进士出身。

唐有恒：美国康奈尔大学理科农学博士、宣统庚戌廷试合格赐进士出身。

唐恩桐：花翎二品衔。

这些就是俗称的“洋翰林、洋举人”。

十九世纪中叶，列强继“五口通商”后，为了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和争夺中国市场，在那不到二十年极短的时间里，在当时

的津、沪、闽、汉这一片沿海富庶之区，急速地寻找和培养他们的代理人。中国近代史时期的“买办阶层”，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产生，并且迅速发展形成大小不同的“买办世家”。到了民国十年（1921）前后，列强的工商机构，逐渐适应了中国的环境，而十多年来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势，给予这些“国际冒险家们”在政治上的配合，使列强工商业的财阀们的入侵力量逐渐巩固。对“买办”的需要逐渐冷淡，这时期，众多的“买办世家”开始分化，他们一部份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另一部分则日趋没落以至消失。唐家村的“买办世家”，自然也不例外。

当唐景星在同治五年（1868）正式成为怡和洋行的买办和在光绪七年（1881）受李鸿章委派筹办招商局的十多年中，他在沪、津等地的商业活动，例如集资、附股等，始终都和在上海、汉各地经商致富的乡亲们有着极其密切的连系和合作，在经济上一贯都是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当中有：唐瑞枝（字高权，汉口阜昌洋行买办，厚生祥茶栈东主）、唐朗山（字高炽，后任阜昌洋行买办）、唐翘卿（字高亮，汇丰银行买办、上海茶业公所董事、上海恒顺宏茶栈、九江谦顺安茶栈东主、华茶公司创办人、“江西会”财团创办人）、唐翼衡（汉口天祥洋行买办），还有唐芝耘、唐廷植、唐廷庚、唐纪常等。他们结成了“买办世家”，控制着皖、赣、闽、苏各省的茶叶资源，先后参与了怡和、太古、招商局在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事业及国际航运事业，利用他们所能控制的航运力量，把中国的茶叶销往欧美、南亚，把中国的土特产运销北美、东南亚、中南美……也协助招商局就当年中国的航运事业的发展 and 权益，与太古、怡和

作激烈的竞事。当年，许多“唐家人”都在他们的各级机构中工作，因此，大量的个人财富得以积累。而唐家村（鸡柏村）的族产、庙产、私人财产和公共事业也因此而获得了迅速的增长。当年，“趁金山”的华侨，寄回来大批的侨汇赡养父母妻儿，也为家乡的建设而踊跃捐输。使得从光绪末期到民国初期这短短的二十年中，唐家村的面貌起了明显的变化。

一、族产、庙产的急剧增长

唐家村的旧城区的面积约两平方公里。据光绪丁亥（1887）续编的《香山县志》载有：“唐家上村（按：指唐家村大部份地区）有正户壹千二百户，附户五十三户。唐家下村（指唐家边山街一带及鸡柏村、菱塘下村）有正户九百三十户，附户十一户，合计共二千一百九十四户。

祠堂：有宗祠如唐氏大宗祠、梁氏大宗祠族祠：如广达祠、豪杰祠、南潮祠、宪尧祠、凤台祠、镜台祠。鸡柏村的隐翠祠石屏祠、珠海祠、松鹤祠，还有众多的大小不一的家祠（五服内的私祠）约计有五十多处。这些祠堂都拥有庞大的产业和土地。而一些私祠的产业多来源於本房子孙的聚资、捐赠，内容不一而足。

庙宇：有全村公认的祖庙（圣堂庙）文武庙、金花庙，还有分散各处的釜涌古庙、芳后庙、三圣宫、花堂庙、龙岗庙、平里庙、牛王宫、华陀庙、仙坛天后庙、先锋庙，以及鸡柏村的南阳（武侯）庙、康公庙、天后庙、先锋庙等大小庙宇十多处。这个庞大的祠堂、庙宇都各自拥有动产和不动产。由於战事动乱的关系，资料散失无存。今天，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数字，只

是经过口头的调查得到一个概数。

族产：唐梁两族在现今中山、斗门之间的金斗湾、小榄石、恒足围和珠海市的南屏广生围、广昌围、上栅麒麟头等处共拥有水田五千亩以上，每年收得的大量田租作为全族经常费用。另外有由银坑经杨寮、茭塘下、南头坑、马仔迳、烟敦山和现今划为警备区的大片山地的林业和长达十公里的海湾、蚝田、渔埠等，都给全乡的公产和祠堂的族产带来庞大收益。

庙产：唐家村的庙宇，都有各自的庙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是圣堂庙了。由於它是全乡公认的“祖庙”，它的财政来源有：田产、蚝塘收益的分成，沿海渔埠的投标金，林业收入的分成、放贷等，使它的资产被认为是全乡的“公产”。它每年的收入究竟有多少，现在无从查对，但是在历史上它曾负担过“唐家团练局”的常年收支和“唐家大学堂”的经常费开支，还有社会事业福利事业的开支等就可见一斑了。

二、国民经济及社会建设的迅猛发展

文教、金融、航运、工业投资、公用事业。

文教方面：随着晚清废科举而兴办学堂和民国共和后提倡男女平等的形势影响下，唐绍仪主持了唐家大学堂的创建。他首先联合了唐家村、鸡柏村的力量，从宝安、崖口人手中取回了合安蚝塘，由两村合营，从每届蚝产收益中抽取成数作为办学经费，使经济有了来源。然后由唐梁两族派专人承办（遗址现仍存在约有一万平方米），校址地势高亢，背山面海，风景优美。开学初，聘请名儒苏默斋先生（苏曼殊族人，同盟会员）来校主教。老师中有几位是女性，使用新学制课本教课。一百多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女生，常年经费由全乡蚝产

抽成，不足之数由两族族产补贴。由于受到社会习俗对女生的歧视，加上社会治安和经费不足，只办了几届就停办了，殊为可惜，

民国十八年(1929)，唐家才有了完全小学——“唐家乡公立小学”，是将下列三处小学合并而成的。

三峰小学：由梁族教育家梁鼎三先生主办，民国十二年(1923)成立。校址在“琴轩祠”，教师多数是本乡人。使用新课本教学。民国十七年(1928)迁往“权玉祠”，改称“四小”。民国十八年(1929)并入唐家公立小学，改称“第三分校”，经费部份由梁族族产负担，学生多数是梁族子弟。

二校：是专供二、三堡子弟就读的初级小学，校舍设在五科祠及釜溪祠，用新课本教学，经费部份由二、三堡支付。民国十三年开设。民国十八年(1929)并入唐家公立小学为二分校。

一校：约在民国十一年(1922)由天池家塾改为初级小学，校址在广达祠，经费由子英房负责。民国十八年合并后改称为一分校。

私塾：多为私祠设立的，以教旧式古典书为主。有天池家塾、仲良家塾、翹卿家塾等，教师有施仲明、黄勉斋、杨秉璋等。民国十七年(1928)中山县府迁来唐家后，全部裁撤。

金融方面：有维安、维新、维德三家银号，其中维德一家只经营了几年就歇业了，而各具背景的维安、维新则时间较长。分述如下：

维新银号：在《唐家团练局红呈》碑文中记载有“江西会”的名字。而民国廿年(1931)的《中山县训政委员会会议记录》

也记载着“唐绍仪提议向江西会借款扩建岐关支线”，另外在唐翘卿於民国九年(1920)的家信中也有：“远达侄亏空江西会公款……”情况。通过上述资料和在本村口头调查说明，“江西会”是光绪初年(1875)由在沪、汉经商的买办们、茶商们集资并联合唐家梁族、上栅梁族、会同莫族共同注资创建的“财务集团”。实际资本多少已无法查证，据说单唐家村梁族就以族产水田五百亩注资。公推当年在香港“东华二院”任常务理事的唐家村人梁锦昭出任维新银号司理(见梁鼎先小传)，它在香港、上海均设有分号，从下列三例可以看到维新银号的实力：

一、光绪十年(1885)贷给“唐家团练局”银壹万六千一百五十两。

二、光绪三十四年(1908)贷给“上恭都兴建金山书院”款壹万余元。(子英房谱)

三、代收岐关车路股金，约在民国廿二年，因经营亏欠，当时的司理梁鼎先拒绝了唐绍仪“集资挽救”的建议而宣告倒闭，委托当年香港大律师罗文锦办理破产事宜。

维安银号：(遗址是现唐家镇新华书店)其创办时期稍后于维新银号，主要资本来源是唐家村海外侨胞及唐家村的富商乡绅，最大量的业务是办理侨汇及各通商口岸的汇款。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时期，维安银号负责中山港工商炼油公司的资金周转、经常费的收支工作。直到抗战开始不久宣告倒闭。

以上两间银号都在香港、上海设有分号，他们发出的“银票”在沪及金山的联号中均可兑现，是属于全职银行之类。

航运事业：《香山县志》载：有一班长行渡“自石岐经唐家至澳门”。后来停办了。民国初年，唐逸川（唐绍仪长兄）与上栅籍的买办集资购买了一艘小轮，取名“都益号”，专门航行由香港经金星门到上栅，沿途载会同、那洲、下栅、东岸、唐家、鸡柏等村的旅客和货物。为了安全，配有武装护航，船头船尾均安装两英寸小炮一门。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因经营不善而卖掉。

陆运方面：在岐关车路没有建成之前，唐家村的唐炜琛、官塘村的卓冠士、上栅村的卢阜诤三人集资兴办了“香山上恭镇通益人力车公司”（1922），承办了北至南朗、石岐、西至三乡，南至前山、澳门的客运工作。

工业投资：自从唐廷枢创办了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及一系列的投资之后，在商界发展的洋行买办兼大茶商的有唐翘卿、唐瑞枝、唐芝耘、唐廷植等。还有在另一方面投资工业的人物，例如梁族的梁滚昭，在民国二年（1913）受盛宣怀的委托，在香港为“汉冶萍煤矿”筹集商股（每股壹百元，股票原件现藏珠海博物馆），而更具规模的，则是“裕繁铁矿”的创办。

自从唐景星创办开平矿务后，唐族豪杰房的唐耐修参与南海人霍守华的集资，於 1913 年创办了“裕繁铁矿”，日本的三井财团也参与投资。霍守华任董事长，唐耐修任总经理。民国十三年（1924）的产量跃居全国第二位（三十四万八吨）。沦陷时，日方强行接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为“敌产”予以没收。解放后获得继续发展，并入淮南煤铁联营公司。（见唐耐修传）

公用事业：抗战前，全村的路灯照明（煤油灯）、道路清洁、

治安巡查(更夫馆)等,均有专人负责。其费用由“祖庙”在本乡产业收入中支付。

消防方面:有一堡、中堡、东堡三个消防队,各自备有手摇喷水车一部(杨程约十米)和全套消防设备。有固定的的半脱产消防队员)村内或邻村遇有火警时,则出动灌救。

在老人福利方面:有三个“帛金会”,用集体筹资的办法筹集一笔资金存入银号生息,遇有会员病故时,可以领取一笔治丧费。另外,“祖庙”有常驻的中医为贫苦村民赠医施药。在各处路口设有茶亭,为路人免费提供茶水。祖庙、族产於每年冬天还发放寒衣。

雄厚的族产、庙产、旅外乡亲们的大力支助,在民国初年的唐家村、鸡柏村、说得上是兴旺发达、盛世丰年的。这都是有了充足的社会积累所致,是经济开放的效果(虽然这些积累中是包含很多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总的趋势而言,是由於“突破了小农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框框才能够得到的,这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在曲折地前进,二十世纪初,正当西方列强被卷入了欧战的漩涡中而无顾及向东方发展的时候,这时,由买办阶层逐渐转化为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家,凭籍已有的优势,获得蓬勃的发展。以经营茶业、航运为主的“买办世家”从各方的经营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由於得到他们的资助,加上在国内外各阶层工作的“唐家人”在经济上的积累而达到了“鼎盛时期”。当年,唐绍仪虽然辞去了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仍然长住上海进行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并且从各方面和乡亲们取得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经济上的联系。

遗憾的是,虽然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共和政制,但是他所倡导的革命方针在旧军阀势力的抵制和冲击下,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欧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他们支持各自的军阀作为“瓜分中国”的代理人,把中华大地变成军阀大混战的战场。使得民国初期的十多年那个“振兴中华”的黄金机会变成了骨肉相残的大倒退。

相反,与此同时,英国却在其属土锡兰斯里兰卡大力发展种茶、制茶工业,不但完全控制了欧洲的茶业市场,而且还打进了中国市场。原来因欧战影响而停顿的太古、怡和两家船队,也重新回到中国沿海、长江的航线与招商局进行再较量。在“时局混乱、外资竞争、政治腐败”的重重打击下,“买办世家”的经济体系开始分解了,唐家村发展所需的主要经济来源中断了,唐家村正在发展中的国民经济的步子也停了下来。

“唐家村”的又一次兴旺——建设中山港

时间一晃十几年，唐家村又获得一次发展的机会，这不是偶然的。

当年，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基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筹划将“唐家环”建成一个无税的国际口岸，以抗衡香港在这面对西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及西南各省例如粤、桂、湘、滇、黔等有关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的垄断地位，经过各方面的多次协商，终于成功了。

民国十八年（1929）二月，南京的国民政府第十九次国务会议决定：“将孙中山先生家乡的中山县定为全国模范县”（见《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记录）。再经过专家、学者、政要们的多次研究，为了配合“中山港”的建设，决定将县府各机关全部移驻唐家村。为此，唐绍仪在民国十九年（1930）向南京国民政府呈交了下列报告。原文如下：

呈：

国民政府请辟唐家港并设海关分关由：

窃查我县唐家环位于珠江下游及西江支流终点，而西江支流又为香港与西江交通之孔道。该环实握珠江两江之交通要枢，复与陆地毗连、公路衔接省道，以之辟作无税商港，对外可移香港之商业而置澳门于死地。对内以与黔、滇、桂相通，为西南诸省出海之要道，亦即我粤自有之门户。绍仪等拟辟该唐家环为无税商港，其理由尤有五端：

（一）唐家环位于国防颇为重要地，查粤省第一重门户为香港，第二重门户即属该环。先总理有见及此，曾与程故海军总长璧光拟辟为军港，正欲举办而璧光先生忽遭于难。现香